

1942年郑延卓赴延始末及相关史实考辨

陈 标

内容提要 本文对1942年11月郑延卓赴延的起因、经过及其意义,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的重视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对郑延卓赴延的身份、郑延卓是否当林彪去重庆时“访问”延安、涉及此事的三份文电(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和《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的时间和作者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 郑延卓 毛泽东 延安水灾 赈济 国共关系

1942年8月初开始,陕北发生水灾,波及十多个县市,尤以延安市、延安县、绥德等地受灾最重。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办理急赈。消息传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特令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等携款赴延放赈。郑延卓等人11月7日自重庆乘飞机到西安,在得到11日毛泽东等表示欢迎的电报后,17日乘车抵延。他们在延安半个月,视察水灾,发放赈款,并与毛泽东谈话两次。完成公务后,他们于12月2日离延返西安,然后返回重庆。郑延卓赴延,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上一件重要事件。毛泽东几次将此事与林彪去重庆相提并论,他和周恩来都谈及此事的意义。然而,史学界对此事记述可以说是若明若暗的。涉及此事的著作均语焉不详,甚至有史实错误。因此,有必要弄清此事的始末,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辨。

一 1942年陕北水灾

郑延卓赴延,起因于1942年陕北水灾。这次水灾,从8月初开始。据《新华日报》记载:“八月二日晚,延河山洪暴发,水势陡涨,小砭沟被卷去行人五名,沟内庄稼悉数冲毁,尤以西瓜一项损失最大,猪羊等亦有不少随山洪漂下,估计损失不下百万元。”^①

水灾波及十多个县市,尤以延安市、延安县、绥德等地受灾最重。据《解放日报》载:“(本市讯)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风雨不时,每年均有大小灾荒,但灾患多是旱灾,像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是几十年来都没有的。今年水灾区域涉及延安市、延安县、延川、延长、环县、绥德分区各县等十数县市,尤以延安市、延安县、绥德等地受灾最重。今年水灾概况,据已有材料之统计,八月内,延安、绥德等十县市居民共损失田禾一二七、八四五亩,损失粮食一五、三三七石,损人口一〇六名,死亡牲畜六五八头,毁盐井六〇口,盐场二〇〇亩,冲走船十八只,树八、四九五株,而延市公营建设事业损失,约值四千四百余万元。”^②

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办理急赈,但仍有困难,急待救济。消息传到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院长、孔祥熙副院长特令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等携款赴延放赈。据《解放日报》载:“各地灾民均于八月水灾之后,业已急救,但目前仍有困难,急待救济。”^③又据《新华日报》报道:“(中央社讯)本年秋间,陕北安塞、延安、延

① 《延安动态》,《新华日报》1942年9月3日第2版。

② 《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国府拨赈款法币卅万元,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石》,《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日第1版。

③ 《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国府拨赈款法币卅万元,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石》,《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日第1版。

川、米脂、绥德各县，河水暴涨，庄稼损失颇重，秋成受影响，尤以绥德一带为甚，业经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办理急赈。又由陕来渝出席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李芝亭、王普函等语记者称，陕省平(民)朝(邑)一带水灾，政府方在设法救济。陕北各县，复因山洪骤发，灾情严重，业经转请粮委速行救济。闻中央得讯，至为关怀，正拟派员前赴灾区慰问，并拨款振济。”^① 据《解放日报》报道：“郑氏首为记者说明此来任务：中枢对此地水灾情况至为关怀，行政院蒋、孔院长特令携款来此，对被灾地区民众致慰问之意。”^②

二 郑延卓赴延放赈

1942年11月7日，郑延卓一行自重庆乘飞机到西安。据报载：“郑先生一行本月七日自渝飞陕，后专车抵延。”^③

郑延卓将要赴延放赈一事，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电告毛泽东等。11日，毛泽东与朱德、林伯渠复电周子健转郑延卓，表示欢迎郑延卓来延安。^④

17日下午，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等人从西安抵达延安，下榻于边府交际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等闻讯趋往访晤。据18日《解放日报》报道：“(本报讯)奉命携款救济边区水灾之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昨

① 《救灾 济难 陕北水灾当地政府已办急赈》，《新华日报》1942年11月3日2版。按，1942年10月22—31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大会在渝召开。

② 《郑延卓先生谈来延任务观感》，《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9日。

③ 《郑延卓先生谈来延任务观感》，《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9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2页。

日下午偕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周励武及其夫人,同车抵延,下榻于边府交际处。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边府林、李主席及各厅、处、院长闻讯后,当即趋往访晤,并致欢迎之意。按今夏边区水灾严重,中枢颇为关怀,特派郑氏前来视察,并施救济云。”^①随后,《新华日报》也报道了郑氏等人赴延放赈的消息:“(西安电)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等一行三人,顷离西安赴陕北延安等地勘查灾情,宣达中央关怀陕北灾民德意,并发放赈款。”^②

郑延卓等抵延后,拜访了林伯渠,随后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据19日该报报道:“(本报讯)国府赈济委员会郑延卓先生等来延后,记者特往交际处谒访。时郑氏等适自边区政府拜访林主席归来,精神至为愉快健旺,全无旅途劳顿之意……闻不日即将视察实际情况,确定赈济具体办法……闻朱德总司令订今日(十九)设宴,为郑氏等洗尘云。”^③

20日晚,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据23日《解放日报》报道:“(本报讯)延安各界特于廿日晚六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欢迎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诸先生,到党政军民各机关学校干部千余人,会场至为欢愉热烈。首由边府林主席致欢迎词,对国府对边区之关怀及郑、梁、张诸先生风霜劳苦深致谢意,并将边区实施三民主义之实况略有叙述。次由郑延卓先生讲话,以团结苦干精神与边区同志相砥砺。末由平剧院演出

① 《国府赈委会派员视察边区水灾,郑延卓氏等昨日抵延》,《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8日第1版。

② 《豫陕赈灾:蒋委员长令广设粥厂,振委会派员赴陕北施赈》,《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0日第2版。

③ 《郑延卓先生谈来延任务观感》,《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9日第1版。

平剧，至午夜始散。”^①一个月后，《新华日报》转载此条消息，将开头几句改为：“（本报通讯）此间一度发生水灾，国府赈济委员会特派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诸先生莅延放赈，计本市共发放赈款十一万元。郑委员留延期间，曾观光各项建设，并受各界热烈欢迎。十一月廿日晚六时，本市各界特于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②

21日上午，郑延卓等与延安市长李景林等在交际处开会讨论决定了具体的赈济办法，共发给延安市赈款法币11万元。据23日《解放日报》报道：“（本市讯）国府赈委会派员视察边区水灾，廿一日上午九时在边区交际处开会，讨论赈济本市水灾。由李市长详细报告本市灾情后，决定赈济办法：（一）抚恤因灾而死者；（二）救济因灾房室被毁者。共发给法币十一万元。死者家属在边区者四十四人，甲等十四人，每人抚恤金七百元，乙等十八人，每人抚恤金五百元，丙等十二人，每人抚恤金三百元；房屋被毁者五十五户，甲等二十四户，每户二千元，乙等二十户，每户一千五百元，乙等十一户，每户五百元。余者作为临时增加补救金。此款由市政府造具延安市水灾死亡人口及延安市水灾急赈两种清册，呈报赈委会核准发给，由受赈人具收据领取。”^③

22日下午，郑延卓等人参观了鲁艺和新华化学工厂。据23日《解放日报》报道：“（本报讯）国府赈委会郑延卓、梁建华、张良丞先生等，于昨日下午乘车赴鲁迅艺术文学院参观，郑先生等下车

① 《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迎郑延卓先生等，赈委会发本市赈款十一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3日第1版。

② 《延安各界欢迎赈委会三代表，郑委员以团结苦干相砥砺》，《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4日第2版。

③ 《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迎郑延卓先生等，赈委会发本市赈款十一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3日第1版。

后,在文艺俱乐部稍事休息后,当即由周杨院长及吕骥、张庚、宋侃夫等同志陪同赴音乐、文学、戏剧等部参观。郑先生对各部教堂情况询问甚详,对学员生活备极关心。并云返渝后,把鲁艺之实际情形告诸大后方文化界。参观鲁艺完毕后,郑先生等即至新华化工厂,由王、董二厂长及建厅赵科长陪引至各工房。郑先生认为化学厂出产肥皂的质量甚佳,极表喜许云。”^①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全文转发此条消息,误把“昨日”改为“十九日”。^②

郑延卓等人除在延安市发放赈款法币十一万元外,还给延安县发放赈款七万元,而绥德的赈款则由专员曹力如、县长霍祝三等携归。据30日《解放日报》报道:“(本报讯)国府赈委委员郑延卓,连日在各地视察灾情,数度召开会议商讨,并征求对被灾之区、乡长及民众代表意见,业经决定具体赈济办法。除延安市方面发赈款法币十一万元业志前讯外,兹悉延安县共拨赈款法币七万元。”“郑委员等并亲往监放,民众均极兴奋,尤对中央之德意至表感激云。”“(又讯)此次郑委员延卓本拟亲赴绥德勘查灾情,发放赈款,嗣因交通阻隔,费时颇多,且适逢绥德曹专员、霍县长在延之便,经商讨结果,郑委员暂不前往,赈款即由曹专员、霍县长等携归,依照计划发放。”^③

陕甘宁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郑延卓等携来赈款共计法币30万元,只发给灾情较重的延安市、延安县和绥德三地,其余灾情较轻地方,则由边区政府设法赈济。据《解放日报》报道:“最近国

① 《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迎郑延卓先生等,赈委会发本市赈款十一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3日第1版。

② 《延安各界欢迎赈委会三代表,郑委员以团结苦干相砥砺》,《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4日第2版。

③ 《延安县发放赈款七万元,郑延卓氏连日视察灾情》,《解放日报》1942年11月30日第1版。

民政府为关怀边区受灾人民，特派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等先生携款（法币三十万元）来延，勘察灾情，赈济受灾人民。边区政府以郑委员等来延，特召集延安市长李景林、延安县长刘秉温、绥德专员曹力如、县长霍祝三等来延，面谒郑委员等报告灾情，并商请救济办法。”^①“又此次为使民众获得实惠起见，所携赈款均多就灾情惨重之区域发放，至其他灾情较轻之地，即由边区政府设法赈济。”^②而“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石”。^③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送郑延卓等。据3日《解放日报》报道：“（本报讯）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八路军留守兵团，于一日假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欢送国府赈委会郑延卓等，计到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千余人。晚会于六时开始，首由谢副议长（即谢觉哉——引者注）致辞，感激中央对边区人民之德意及郑先生等远道奔波为国为民之艰苦精神。旋即请郑延卓先生讲话。郑先生以恳切态度叙述半月来逗留边区之观感，略谓……（引者略）这次奉蒋、孔院长之命来此赈灾……（引者略）。本拟继请梁建华、张良丞二先生讲话，但因晚会节目将开始，梁、张二先生又谦辞作罢。晚会节目共有三项：《晋察乡村》（活报）、《丰收》（三幕话剧），均由十八集团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出，至深夜宾主即尽欢而

① 《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国府拨赈款法币卅万元，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石》，《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日第1版。

② 《延安县长刘秉温、绥德专员曹力如、县长霍祝三等来延，面谒郑委员等报告灾情》，《解放日报》1942年11月30日第1版。

③ 《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国府拨赈款法币卅万元，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石》，《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日第1版。

散。”^①

郑延卓等人自11月17日抵延，在延安半个月，12月2日离延返西安，然后返回重庆。据毛泽东12月1日致周恩来、林彪电称：“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②12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中央社西安七日电）中央关怀陕北灾情，前派赈济会委员郑延卓等一行三人，前往延安振灾，现返西安，定日内返重庆复命。据郑氏谈，此行在延盘桓半月，并视察灾区，亲自发放赈款，民众对中央德意极表感奋。”^③同日《新华日报》刊登此条消息时，作了简化：“西安电：中央前派赈济委员会郑延卓等一行三人，前往延安放振，盘桓半月，并视察灾区，兹已公毕，返抵西安，日内返渝复命。”^④

三 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的重视

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十分重视，除去电表示欢迎外，还两次在文电中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相提并论，两次与郑谈话，两次在电文中述及与郑谈话内容，并应郑延卓要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两次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相提并论。1942年11月29日他起草《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时写道：“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⑤同月30日致彭德怀电又写道：“林彪已去重庆，国民

① 《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送郑委员等，郑氏称赞八路军战线，把团结抗战精神带回去》，《解放日报》1942年12月3日第1版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21页。按，该书把此电时间误定为1943年1月1日。

③ 《郑延卓抵西安，定日内返渝复命》，《解放日报》1942年12月9日第1版。

④ 《要闻简报》，《新华日报》1942年12月9日第2版。

⑤ 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3页。

党派郑延卓来延安。”^①

毛泽东与郑延卓谈了两次话。郑延卓离延前一日即1942年12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述及谈话内容如下：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②谈到具体问题，他说不会很快。^③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郑延卓问：何时实行，毛泽东答：具备条件后就实行，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又说，三民主义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④毛泽东还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⑤“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1943年1月16日毛泽东复周恩来、林彪电，述及与郑谈话的另一内容：“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⑥

郑延卓离延的前一日即1942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郑延卓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1页。按，该书把此电时间误定为1942年10月30日。

② 此段有引号的文字，均据《毛泽东年谱》中卷421页所引原文。

③ 张家裕主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91页。该书将该电误断为1943年1月1日。

④ 李良志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09页。该书注①亦将此电时间误为1943年1月1日。

⑤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26页；胡哲峰、于化民著：《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77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21页。

要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该信全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轅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藉致悃忱。敬颂
勋祺。不具。

毛泽东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①

四 郑延卓赴延的意义

关于郑延卓赴延的意义,前引毛泽东致蒋介石信中述及两点:一是带来——“宣布中央德意”,二是带回去的——“此间近情”,“以备采择”的毛泽东与郑延卓谈话的内容。1942年12月12日周恩来写的《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则谈及三点:“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示中央德意,试探我党真意(时间在十一月)。”^②在恢复国共两方关系方面,前已述及毛泽东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示中央德意”,前引报纸和毛泽东致蒋介石信中都曾提及。至于“试探我党真意”,其详情如何,尚待研究。

① 毛泽东手迹,见李树庭等编:《书家毛泽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06—207页。

②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16页。按该书误断提纲时间为1943年12月12日。

五 相关史实考辨

(一) 郑延卓赴延的身份

《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写道：“国民党先是由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①这是把毛泽东致蒋信中“郑委员”的“委员”误会为“中央委员”了。其实，根据前引报纸，毛泽东所说“委员”，是指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而不是指“中央委员”。

《毛泽东年谱》的一个注释说：“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三十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②此说不知有何根据？前引报纸虽有“陕北各县，复因山洪骤发，灾情严重，业经转请粮委速行救济”的记载，但“粮委”恐系“赈委”之误，因为当时的报纸都说郑延卓是国府赈委会委员，没有说他是“粮委”委员，也没有说他是“粮食部参事”的。且他带去的是赈款30万法币，而不是粮食，与粮食部也毫无关系。当时的报纸把“赈委”误为“粮委”，已经是错误了。《毛泽东年谱》注释把“粮委”误为“粮食部”，则是误上加误。

《毛泽东军事年谱》说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林彪：国民党政府参事郑延卓在延安住两星期”^③，但《毛泽东年谱》所引毛泽东原文是“郑延卓在延两星期”，并没有“国民党政府参事”几字。可见《毛泽东军事年谱》把《毛泽东年谱》误注的“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略去“粮食部”三字后，误加到毛泽东电文的内容中去了。这

① 《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12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1页注[1]。

③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91页。

又是误上加误。

总之,郑延卓赴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而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或“国民党政府参事”。

(二) 郑延卓是否当林彪去重庆时“访问”延安

《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用了一页的篇幅谈及郑延卓赴延一事。但由于不明此事始末,只能含糊其词。其中一句话,“当林彪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重庆时,国民党也派郑延卓访问延安”^①,就有两个史实错误:第一,当1942年10月7日林彪“去重庆”时,国民党尚未派郑延卓到延安。此点前引毛泽东起草的指示写得很清楚:“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第二,郑延卓赴延并不是“访问”,而是放赈。

(三)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的时间

该信手稿,本有落款时间“卅一年十二月一日”,即1942年12月1日。如果全引,是不会搞错的。然而,删去引文落款时间的坏习惯,使得一些史书弄错了该信的时间,而编校者也难以觉察其错误。

如《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一书正文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蒋介石”,而引文的脚注却是“毛泽东致蒋介石函,1942年12月10日。”^②同一封信,却有两个不同的时间,编校者不知哪个是对的,只好听之任之。

又如《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一书几乎全文引用

① 《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309页。

② 毛磊、范小芳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97页。

了毛泽东致蒋介石信时，却删掉了落款时间和祝颂语“敬颂勋祺不具”。^①脚注误为“《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1月1日”。^②也许审校者以为书中所引毛泽东信的内容，都转引自毛泽东的电报。

假如引文中保留原函落款，细心的编校者是不难发现上述错误而予以纠正的。

(三) 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的时间。

一些书认为该电的时间是1943年1月1日。如前引《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的脚注“《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1月1日”。又如《毛泽东年谱》421页1943年1月1日条写道：“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情况……”^③再如《毛泽东军事年谱》1943年1月1日条也写道：“电告周恩来、林彪：国民党政府参事郑延卓在延安住两星期……”^④有的书则注明该电的时间1942年12月1日。^⑤

上述两说，孰是孰非？经考证，1942年12月1日正确。因为该电写道：“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如前所述，郑延卓到延安的时间是1942年11月17日，“两星期”后即12月1日，“明日返渝”，即12月2日返渝。这与前引1942年12月9日《新华日报》所记“盘桓半月，并视察灾区，兹已公毕，返抵西安，日内返渝复命”相符。假如该电时间为1943年1月1日的话，那么“明日返渝”就变成了1月2日返渝，郑延卓在延就不是“两星期”或“半月”

① 删去祝颂语而不加省略号，就接上落款“毛泽东”，容易使人误以为毛泽东原信就是如此连起码的礼貌都不讲的。

② 《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309页注①。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21页。

④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91页。

⑤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126页注①。

了,而变成1个月又两星期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四)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时间

前引毛泽东30日致彭德怀电,《毛泽东年谱》作1942年10月30日^①,实际应当是11月30日。理由是:

第一,该电称:“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说的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林彪是10月7日从西安乘飞机直赴重庆的,也许编者就是据此而断定该电时间为10月30日。但是,直至1942年11月3日,《新华日报》还说“正拟派员前赴灾区慰问,并拨款赈济。”尚不知派谁,毛泽东怎么会在10月30日就知道了“国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呢?如前所述,毛泽东知道郑延卓要来延安而去电表示欢迎的时间是11月11日,据此可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时间是此日之后的11月30日。另外,“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与前引1942年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中的两句话“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意思相近,因此,两者时间也应当相近。据此,也可知该电的时间应当是1942年11月30日,而不是一个月前的10月30日。

第二,该电称:“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这是对彭德怀11月4日致毛泽东电中如下内容的再次^②答复:准备将抗大约2500人及从华北抽出的5000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1页。

② 说“再次”,是因为11月17日毛泽东曾复电说:“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3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页。按,17日电,《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88页、《彭德怀年谱》第273页均作11月17日。但《毛泽东年谱》第407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第479页均误为“10月17日”。

- 10000名干部及技术人员,送延安保存教育,以备将来发展时使用。^①据此,也可知毛泽东电报的时间是11月4日之后的11月30日。

第三,该电称:“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这个判断,是毛泽东11月29日分析了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议后作出的。毛泽东认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②据此,也可知该电的时间是11月29日之后的30日。

根据上述三点,可以断定该电时间是1942年11月30日。

(五)《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的年代和作者

这个提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全文收录时,题下注明时间为1943年12月12日,无作者姓名。^③《周恩来年谱》1942年12月12日条写道:“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④,也没有说明提纲的作者。于是就有两个问题:提纲的年代究竟是1943年还是1942年?提纲的作者是谁?

经考证,这个提纲是周恩来1942年12月12日为14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党员大会上作报告而写的提纲,但到1943年1月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7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57页。

③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31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543页。

才报告给毛泽东。理由如下:

第一,《提纲》所述之事均发生于1942年,未涉及1943年之事,因此成文时间不是1943年12月12日。

“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示中央德意,试探我党真意(时间在十一月)。”郑延卓赴延放赈是在1942年。

“蒋委员长两次见周及林师长来渝,造成了两党关系的缓和及谈判之门重开(时间在七至十一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是在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林彪到达重庆是在1942年10月7日,13日,他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

“蒋委员长在十中全会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其基本意思,是趋于政治解决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于1942年11月12日至27日召开。

“我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见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二版)有强调好的同时并重申我党立场,以推动其好转。”194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先载30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12月9日第2版发表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中决议的意见》。“我党立场”,即“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

“我党中央的指示要点:(1)历史的估计——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两次反共磨擦均有国内国外的因素。(2)从去年停止大的冲突到今年的好转,其中经过显然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推动和影响。(3)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总结,这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解决(我党中央指示文)。”“我党中央指示”即1942年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提纲》

所引指示各要点中,第一要点的原文是:“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〇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第二要点的原文是:“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第三要点的原文是:“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①

“而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本的口号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原因在未开辟欧陆第二战场。”1942年7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公布“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改变了这个口号,并对此作过多次解释。^②由此可见,提纲写于“今年”即1942年,而不是“明年”即1943年。

第二,1943年1月,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电说:“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据中央发言人谈话及指示,将国共问题在办事处党员大会中作了一个报告(提纲将以朱电告),估计国共问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58-460页。

② 关于这个口号的提出和放弃,参见拙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抗战胜利时间估计的变化》,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题目前还在两可之间,即相机解决或拖。此估计已证明是对的。”^①比较《提纲》所说:“目前空气是和缓了,关系是恢复了,但好转是一个趋势,能否具体解决问题,还在两可之间(或拖或相机解决)。”可知《提纲》就是周恩来 1942 年 12 月 14 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党员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提纲在报告前两日即 12 日已经拟好。但迟至 1943 年 1 月才“电告”毛泽东,因而被误作 1943 年 12 月 12 日。

综上所述,《提纲》的时间是 1942 年 12 月 12 日而不是 1943 年 12 月 12 日,作者是周恩来。

(作者陈标,1958 年生,桂林工学院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刘 兵)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 册,第 306 页。按,“以朱电告”似为“以后电告”之误。